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的早期建设

Early Construction of the 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 Museum

王墨茕
Wang Moqiong
（青岛市科技馆，青岛，266071）
(Qingda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Qingdao, 266071)

内容提要：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最初作为华西协合大学的教学附属机构，自1914年开始筹备建设。基于现四川大学博物馆所藏历史档案中的来华传教士书信与博物馆会议记录，梳理该馆初创时期的藏品来源、场馆建设、展览实践等史实，考证文物征集体系与展陈空间规划，展现近代博物馆理念在华西地区的实践特点。同时考察传教士与本土学者在华西地区田野考古、民族文物调查、边疆调查等成果，分析该馆在20世纪上半叶形成的学术传统及历史价值。

关键词：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　传教士　戴谦和　葛维汉

Abstract: The 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 Museum, initially established as a teaching-affiliated institution of the university, began its preparatory construction in 1914. Based on historical archives preserved by the present-day Sichuan University Museum, including missionary correspondence and museum meeting minute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facts regarding the museum's early-stage collection sources, venue construction, and exhibition practices. It investigates the cultural relics acquisition system and exhibition space planning to demonstrate the implement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museum concepts in western China. Furthermore, it explores the achievements between missionaries and local scholars in field archaeology, ethnic cultural relic surveys, and borderland investigations across western China, analyzes the academic traditions and historical value formed by the museum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Key Words: 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 Museum; missionaries; Daniel Sheets Dye; David Crockett Graham

博物馆的创办是中国近代社会西学东渐进程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最早的一批博物馆主要由在华传教士创立，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作为其中的佼佼者，在馆藏、展览、学术研究以及传教士活动等方面都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一、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概述

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①（以下简称华大博物馆），“最初是华西协合大学生物系和西洋史学系所设‘人类学’课程的教学附属机构，是全西南地区最早建成的现代博物馆”[1], [2]75。美国传教士戴谦和（Daniel Sheets Dye）担任首任馆长，与陶然士（Thomas Torrance）、叶长青（James Huston Edgar）、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孔昭潜（A. P. Quentin）等传教士在四川、云南、贵州和西藏等地收集文物和自然标本等。华大博物馆早期建设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1914年至1919年的筹备时期、1919年至1932年戴谦和任馆长时期、1932年至1941年葛维汉任馆长时期、1941年至1947年郑德坤任馆长时期。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华西协合大学部分专业及博物馆并入四川大学，在此基础上结合四川大学原有的博物馆、动物标本室、植物馆等，组建了四川大学历史博物馆和四川大学自然博物馆。

关于华大博物馆，有多篇概要性的介绍文章。葛维汉发表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上的《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The 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 Museums*），是其在接任华大博物馆馆长一职后所作，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华大三个博物馆的情况[3], [4]1208；1936年出版的《中国博物馆一览》中收录《私立华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一文，概述了华大博物馆的沿革、建筑、组织架构、经费来源、藏品情况、出版物及职员情况[5]；1951年发表的《华西大学古物博物馆概况》介绍了当时成都博物馆的馆藏情况[6]；《四川大学博物馆：历史与今天》一文中也提到了华大博物馆的“艰难创业”阶段[7]。此外，亦有少量时人参观华大博物馆的记录和观后感，如卫聚贤的《华西大学博物馆参观记》[8]。本文的研究材料以四川大学博物馆所藏档案为基础，这些档案多为1919年之后的信件，主要记载博物馆内部管理事务；同时还参考了《四川大学博物馆馆藏目录》，它是四川大学博物馆现存旧账，记载了1910年至1947年间的约5820条藏品条目。

二、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的建设过程

（一）筹备与开馆

1914年，华大同意戴谦和先生“收集科学价值的物品”[9]，拉开了华大博物馆筹备的序幕。“从博物馆档案看，登录的第一件藏品，即1/c也是1914年收藏的。这第一件藏品是学校的校钟，备注栏里有一段极好的记录：‘当新钟已经安好，旧钟就送到博物馆，作为博物馆的第一件藏品。’”[10]

根据《四川大学博物馆馆藏目录》记载，有两件藏品在1910年作为礼物赠送给华大博物馆，由戴谦和收藏，分别是一份“Government customers receipt（政府海关收据）”和三份“Chinese calling cards（中国名帖）”[11]。但是这两件藏品在《目录》上未登记编号，也无法找到实物，因此不能确切地说华大博物馆的筹备始于1910年，仅在此提出以供参考。

戴谦和在1919年12月18日给友人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我们即将开放博物馆，希望它既可以成为一个展览的地方，也可以成为一个有教育意义的机构。”[12]

1920年1月17日的档案记载了一次“博物馆之夜”的活动，活动介绍了博物馆的宗旨，展出了邮票、中外钱币、印第安和中国

① “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由自然历史博物馆、牙医学博物馆及古物博物馆三部分组成。一般说来，自然历史博物馆和牙医学博物馆都用其馆的全称，而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专指华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曾一度称为哈佛燕京博物馆、华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曾简称为华西大学博物馆、华大博物馆、古物博物馆、博物馆古物分馆等。”参见周蜀蓉：《〈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作者小传》，《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整理影印全本》第10册，中华书局，2014年，第4580页。

箭镞、矿石和化石、窗格，并详细介绍了一座汉墓及其陪葬品[13]。这说明至迟在1920年1月，华大博物馆已经开放并举办展览。因此可以认为，华大博物馆开始筹备的时间应为第一件藏品旧校钟入馆的时间，即1914年，而正式开放于1919年末或1920年初。

（二）藏品来源

自戴谦和着手筹备博物馆，至其离任、葛维汉继任馆长职务，华大博物馆的藏品规模由一件旧校钟扩展至六千余件，涵盖了中国汉、藏、羌、彝、苗等民族文物，以及美国、日本、欧洲、巴勒斯坦、澳大利亚、加拿大、非洲、暹罗、爪哇、土耳其、叙利亚、缅甸等国家和地区的生活、宗教、艺术类藏品[4]1210。这一时期藏品的来源主要包括向在华西考察的传教士购买、传教士捐赠、与他人交换、公开征集等途径。

1. 购买与捐赠

《四川大学博物馆馆藏目录》中有记载确切来源的藏品，绝大部分是由陶然士、叶长青、葛维汉和戴谦和等人购买所得，较少部分由其他传教士捐赠。其中部分条目的资料较完整，兹整理成表（表1）。

由于博物馆经费有限，戴谦和也会利用私人关系筹措藏品。在得知友人即将前往新西兰时，他致信友人希望能够带回毛利人的生活和战争用品、图腾柱、动物化石或标本和珊瑚等[14]。在另外两封写给友人的信中，戴谦和提到：

> 我只是想知道，你是否愿意考虑这个建议：借给大学博物馆一些你丈夫收藏的稀有标本。……我们将把它们放在玻璃柜下展览，就像自己的物品一样珍惜。

> 傅士德（C. L. Foster）先生已经给我们一批峨眉的化石，叶长青先生借给我们一批旧石器时代的石器工具，陶然士先生借给我们一批汉代陶器；傅文博（George M. Franck）先生正准

表1 《四川大学博物馆馆藏目录》（复印本）部分条目

编号	名称	件数	来源地		收到方式	收藏时间	备注
	中式名帖	3	国内	四川	戴谦和收到礼物并捐赠	1910年	红纸
T/13	银胎木碗	1		西藏	Young女士（L. M. S）购买	1922年10月21日	
	？棺材	1		成都附近	陶然士购买	1923年1月19日	
T/616	藏族？装饰	1		西藏	购买	1931年7月24日	价5元
	十字挑花绣件	11		成都	戴谦和购买	1936年	
	浅蓝绸巾	1		崇州附近	戴谦和购买	1937年9月3日	
	皮影灯	4		成都	购买	1937年12月2日	
	宋代钱币			四川	购买		1156年
	木雕	1			刘购买	1921年？月22日	
	镜子	1			陶然士购买	1922年？月3日	
	土耳其银币	5	国外	土耳其	戴谦和收到礼物并捐赠	1934年1月13日	
	叙利亚银币	4		叙利亚	戴谦和收到礼物并捐赠	1934年1月13日	
	政府海关收据	1	不详		礼物	1910年	清代
	拓片	5			购买	1937年11月	

备借给我们一批四川蝴蝶标本，夏时雨（H. J. Openshaw）先生和布礼士（A. J. Brace）先生送来一批一战纪念物。此外，还有一些美国公司制作的美洲印第安人纪念物。差点忘提，甚至有一些十分稀有的中国钱币收藏品。[15]

得知你对中国事物非常感兴趣，便写信给你，希望你能向大学博物馆出借或赠送一些认为值得展示的旧拓片，或者具有吸引力的物品。[12]

戴谦和与孔昭潜在1921年与1923年间有多次书信往来。孔昭潜于1897年到达华西，最早在嘉定（今乐山）活动并收集鸟类标本，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上发表了《华西和长江下游地区常见鸟类》等文章，“20世纪30年代华西协合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陈列的鸟类标本，大多源于他的采集”[16]。在戴谦和写给孔昭潜的信中，戴也表示孔寄到的鸟类标本很好，并且已经在展[17]。

华大博物馆还有很大一部分藏品来自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学会传教士在华西开展田野考察，将所获物品交给华大博物馆，以便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博物馆用得到的相关赞助经费，支付他们一定的费用，其中以陶然士、叶长青和葛维汉所提供的藏品尤多。葛维汉在宜宾工作时，收获颇丰。他与戴谦和有很多书信往来，寄给了戴诸多物品，其中部分以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名义移交，并得到了史密森学会的赞助。

傅文博已经同意安置我为博物馆弄到的所有标本……由于害虫或者发霉的原因，鳞翅类标本极易受损，但我从美国回来后，就未损失过一件蛾或者蝴蝶标本。……这些标本在任何人的手里都不安全，直到它们被安置在博物馆。

……我已为大学博物馆做的，只是计划中的一小部分，尤其是通过史密森学会。我的计划无需大学博物馆花费多少钱，但是若有可支配的经费就更好了。[18]

在成都的时候，我买了一些鼻烟壶，将其交给布礼士，让他以研究学会的名义移交大学博物馆。那时候值1.5美元，现在应该值3美元。[19]

我通过任福根（L. A. Lovegren）寄了一小盒古董。里面有一件狗尾巴，出土于乐山蛮子洞，还有一件看起来像鸭头的东西，出土于同一个地方。[20]

我希望今后能为博物馆寄送更多有趣的东西。通过任福根先生寄了四个花瓶，它们或许可以归入艺术类或植物学类之下。……你可以将两个放在植物学部，两个放在博物馆，具体如何处理，都由你决定。……请告诉我你还对何物感兴趣，当其出现时我好寄给你。[21]

任福根来信告诉我，留在乐山交其保管的所有给博物馆的物品，都已由甘来德（H. L. Canright）博士带到成都。希望你已经收到。[22]

2. 交换

除了购买与接受赠送，还有一小部分藏品是通过交换得来的。例如在1921年，戴谦和与新西兰人苏道璞（Clifford M. Stubbs）博士交换了藏品，部分清单见表2。在这次交换中，中国物品共计24种，新西兰物品11种，而具体件数不详。之后在1948年，华大博物馆与上海大学的比思（Beath）教授交换了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但未见具体的清单[23]。

3. 公开征集

此外，华大博物馆也公开对外征集藏品。

博物馆开放了5个月，已经有了一些很好的藏品和一些具有不寻常价值的碎片。现在有一个机会使博物馆变得非凡，那就是展示有价值的藏品和艺术品——欢迎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的有价值的东西，更欢迎当地的和中国的东西，尤其是四川城市和某些外省城市的有特色的产品……

博物馆委员会恳求建议、借款借物和对博物馆有利的建设。[24]

自接任馆长后，葛维汉定期在《华西教会新闻》上刊登受赠清单。1934年10月至1938年4月，华大博物馆累计接收捐赠物品685件，包括陶瓷器、砖石器、玉器、金银器、铁器、织物、乐器、钱币、书画、各族饰品、宗教用品、鼻烟

壶、地图、书籍，以及美国、希腊、日本等国的物品，捐赠者有传教士、华大师生、学者、西藏喇嘛及其翻译人员、商人、艺术家、官员、军官，捐赠机构包括各地博物馆和研究院①。

（三）博物馆的展览

华大博物馆最初作为华大的附属教学机构，早期展览主要面向华大师生。后来名声渐起，也吸引了社会公众前往参观，1936年10月13日当天，有近一万人入馆参观[25]。同时，博物馆也利用展览筹集资金，帮助学生缴纳学费，为学生提供勤工俭学的机会[23]。

葛维汉接任馆长一职后，华大博物馆藏品规模显著扩大，新增8个大玻璃柜、14个壁柜，藏品数量超过一万件。华大博物馆也成为拥有羌族文物最多的博物馆，藏品涵盖古代服饰、皮甲、绣花鞋、腰带和众多陶器。在一些喇嘛的帮助下，博物馆还根据藏传佛教佛堂的形式布置了3个展柜，均为稀有珍品，包括画作、镀金花瓶、镀金弥勒像和观音像、铜质磕粑像、花纹茶壶、神鼓、法铃、法螺、号角、喇叭、衣物和念珠等（图1）。此外，博物馆还收藏了大量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石器，清代服饰，300余件各式鼻烟壶，1000余件各式花瓶、盘罐、药瓶、香炉，周代至近代的铜器，一柜玉器，1500余件中国钱币，

表2　1921年藏品交换清单[26]

中国物品	新西兰物品
华西的树木、竹子样本	本土树木样本
不同阶段的蚕蛹	本土鸟类标本
公元前和现代的砖瓦	珊瑚、化石、地质样本
石器拓片	原住民毛发样本
陶器、金属器②	原住民的图腾柱和雕刻
织绣品、粗布衣、皮鞋、布鞋	原住民的织物
中式刀、筷子、饭碗	原住民的碗
中式乐器	原住民的乐器
中式木工钻、挖耳勺、挑水工具	原住民的工具
现代使用的各种面额的现金、铁钱	原住民的武器
中式扇子	其他具有民族学意义的物品
戏院和新年用的面具	
船屋、水车、轿子模型	
2000年前的陪葬品——泥塑和容器	
冥币——金银纸鞋、现金纸、纸人等	
官员穿戴的满族等级饰品③	
中式女性抹额	
中国书法作品	

念珠，清代饰品，以及一柜四川汉州（今广汉）发掘的藏品（图2）。至1935年，馆内已经有大号玻璃展柜14个、中号23个、小号6个，分别摆放在各间标本陈列室、办公室和走廊，柜内有电灯，可供夜间参观，所有门窗都加装铁护栏，用于保护藏品[27]。

根据卫聚贤于1940年所作的参观记，我们可以构建出华大

① 参见《华西教会新闻》刊载的葛维汉《华西协合大学考古博物馆受赠礼物》（*Gifts to the 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 Museum of Archeology*），分别出自1935年5月第5期第31—32页、1935年11月第11期第43—44页、1936年7—8月第7—8期第41—42页、1936年11月第11期第23页、1938年5月第11期第189页。

② 其中有的陶器、金属器有卷雷纹图案，和新西兰原住民图案类似。太平洋地区——北美洲、南美洲、新西兰和中国早期文明的图案设计很相似，似乎存在着某种联系。

③ 原文为“Manchu placques of rank worn by officials”，可能是顶珠或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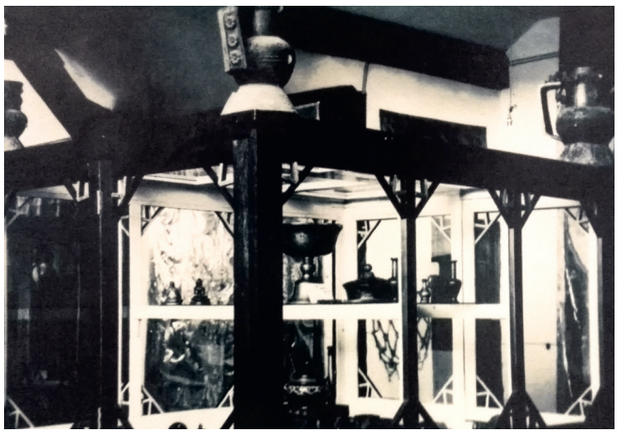


图1 佛堂式展柜[4]1205



图2 广汉出土文物陈列[4]1210-1211, [28]

博物馆在图书馆二楼的布局（图3）：楼层“东西向而南北长”，北为中国古物美术品室，内有6个大陈列橱，四周靠墙有21个小橱，小橱一般内有四层；中间走廊陈列2个大橱、3个小橱，东西两侧各有5个廊间；南为西藏物品陈列室，有1个大橱、1个小橱，以及一座西藏独木梯①。

三、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的特点

基于教会大学的背景和华西地区的地理条件，华大博物馆在建设过程中彰显出专业性和地域性的特点。

（一）专业性

在20世纪初，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所倡导的“抢救原则”成功地将人类学学科引出进化论的迷阵。根据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抢救性的田野工作”力图彻底进行纯粹的材料搜集，而不主张对材料做出过度阐释和翻译。戴谦和、葛维汉以及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成员均不同程度地受到这一思路的影响[2]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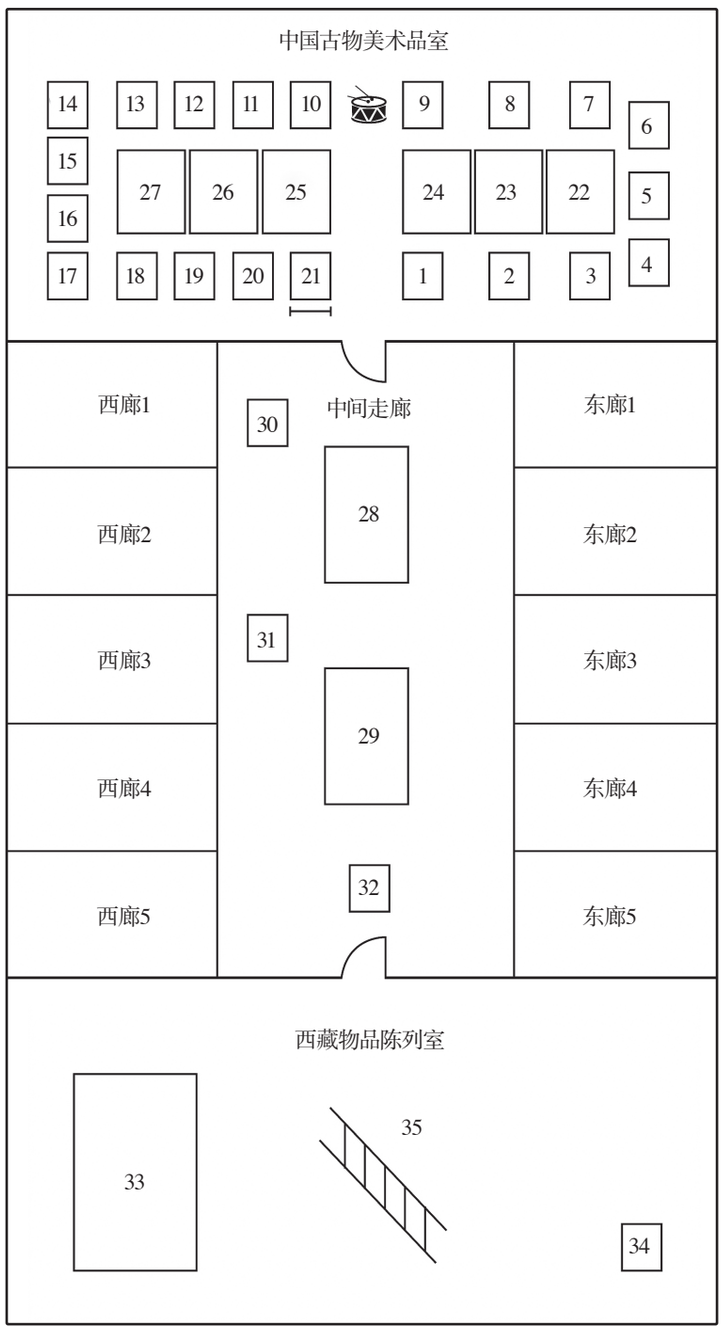
当我谈到“华西博物馆”这个主题时，我脑中浮现的并非是旧货店或“古玩街”，而是一系列原始材料、基础数据——是尽可能在现场搜集而来的，彼此之间或多或少是相关的，被有序排列以讲述一个故事。即使它现在不能讲述一个故事，收藏者期望他或其他人有足够的洞察力来联系和解释，进一步收集“拼图块”来填补其中的缺漏，这些碎片也终将会变成一个连贯的故事。[29]

事实上，从戴谦和到葛维汉，华大博物馆始终遵循这个原则进行“原始材料”和“基础数据”的搜集。“古物博物馆的边疆考古始终以实物采集为工作重心，这奠定了该馆陈列与展览的基本格局，也为探寻中原文明与边地文明之间的联系提供了大批实证材料。”[2]80这不仅对文物保存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郑德坤任馆长时期博物馆开展大量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二）地域性

华大博物馆在华西边疆研究方面有其地理优势。云贵川藏地区约占中国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成都平原地区拥有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边地少数民族独特的风俗文化也吸引着众多研究者的目光。“认识各族的文化特质，进而研究各族文化的互相传播、同化的现象，说明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过程，同时探讨各族经济、政治、社会教育文化等问题的症结所在，以为改进各族生活的依据。”[30]随着1922年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成

① 卫聚贤对西藏物品陈列室“暂无兴趣，故略而不详”。



1. 周口店安阳城子崖等处石器、陶器、甲骨等，四川理藩彩陶四块
2. 长沙出土古物，铜剑、汉代绿釉陶狗、陶冥钱、宋代瓷器、布印纹陶片十余块
3. 四川广汉墓葬出土古物，一层有无孔石铲、长玉铲、长玉刀、仿造长石刀、残石刀、玉琮、粗陶釜、无底残陶缸，二、三层为墓葬下层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陶片及石器，四层为石壁及残片；橱外有两块石壁，大者直径二尺七寸、厚约三寸、孔径约六寸，小者直径约二尺
4. 四川汉墓出土物，陶鼎、陶豆、陶缸、瓦当、五铢钱、铜斧、铁剑、铁刀、铁锄头等
5. 陶鸡、陶狗并灶，大陶尊、大陶洗、大陶缸，着草鞋陶俑、持戈俑、舞俑、弹琴俑等
6、7. 汉代小俑
8. 洛阳出土唐代施釉俑等
9. 近代铜器
   9、10之间陈一铜鼓
10. 铜镜
11. 清代顶子、《永乐大典》服部全卷
12. 清代饰品
13. 玉器，有少数汉玉
14. 清代雕刻
15. 宋代瓷器
16. 原文缺
17、18、19. 清代瓷器
20. 鼻烟壶四百余件
21. 银币、铜币、纸币、布币等各式钱币；橱后有一架古钱
22. 汉代陶器，大陶犬、大陶棺等
23. 成都附近出土唐宋以来的施釉俑和瓷器
24. 汉代铜器，洗、壶、剑、戈、矛、斧等
25. 汉、唐、宋瓷器
26. 明代瓷器
27. 清代瓷器
28. 叶长青在西康、夔府、懋功、威州、叙府、重庆至嘉定段长江南岸发掘的凿、铲、戚、钁等新石器，南洋各地旧石器
29. 叶长青在西康采集的旧石器
30. 欧美地区的新石器、鹿角、骨器、犹太彩陶数片、印第安兽纹彩陶
31. 叙府（今宜宾）珙县出土的小锛、小凿、小钁等新石器400余件
32. 珙县僰人墓出土的棺木、宋明时期瓷罐瓷碗等
西廊1. 彝族用品
西廊2. 羌族织物、陶器、独木梯
西廊3. 川苗花纹刺绣，丽江么些人（摩梭人）用品
西廊4. 川苗芦笙等乐器
西廊5. 贵州花苗物品
东廊1. 邛窑出土瓷器
东廊2. 成都琉璃厂出土瓷器
东廊3、4、5. 清代服饰盔甲
33. 佛堂式陈列橱
34. 藏传佛教、苯教物品，藏族用品，佛像、唐卡、咒语石器等
35. 西藏二十一级独木梯

图3　华大博物馆展陈示意图

立，华大博物馆与学会相互依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华西学派”和华西边疆研究。

从现存档案来看，华大博物馆初期馆藏主要有三类：华西的动植物标本、中国古物、少数民族物品。“其中对于民族文化有特殊关系者，则为边地各民族如羌人、藏人、川苗、花苗、猓罗、摩梭等物品之搜集。……皆属难得之物……非他处之所能及。”[31]13 1934年，华大古物博物馆共有藏品11634件，其中藏族藏品1164件、羌族藏品289件、彝族藏品31件、苗族藏品22件，共占藏品总数的13%[4]1211。至1935年，藏品总数增至15885件，藏族藏品2099件、羌族藏品358件、彝族

藏品34件、苗族藏品235件、摩梭人藏品9件，共占藏品总数的17%[31]14，有了显著的增长①。

四、余论

华大博物馆既具有一般博物馆所具备的展示、教育功能，作为传教士建立的博物馆，还提供了一条让西方认识中国、国人重新认识华西的路径。

尚未充分开发的华西地区对于热衷探险并致力于学术研究的传教士来说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戴谦和认为“川康、打箭炉、巴塘、西藏地区，包括峨眉山，存有特殊物种，与非洲未知地区比较，值得去探险”[32]221；葛维汉也认为“华西……有超过2000年的历史古迹、雕刻、墓碑。博物学家在此发现超过欧美地区同一纬度植物总类50%的植物。而且新的鸟类、昆虫新种在不断被发现”[32]223-224。自1924年开始，华大博物馆与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合作，开展了松潘、黄龙地区调查，凉山彝族地区调查，新津江口崖墓调查，乐山崖墓发掘，华大校园唐墓发掘，广汉三星堆考古发掘，叙府汉墓考古发掘，邛窑、琉璃厂窑考古调查，西康考古考察，王建永陵发掘，望江楼公园唐墓发掘，成都文庙旧址发掘，邛崃龙兴寺唐代遗址发掘和华大汉井发掘等活动[28]。这些调查发掘活动向世界展示了华西地区自然和历史文化的多样性，也让华大博物馆在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方面享有盛誉。

除了传教士的研究，众多中国学者在华大博物馆工作岗位上也完成了不少关于华西的学术研究，使国人对被视为“蛮夷之地”的华西有了重新认识。郑德坤担任华大博物馆馆长后，“改良馆内陈列，确定以研究边疆问题为中心”[33]，他认为“华大博物馆地处古蜀国首都，居川省之中心，在考古学上为未开发之原野，千百原始文化遗址，尚无人问津，其能成为人类学研究中心，当可无疑”②。在这期间，郑德坤著有《四川史前考古》《四川古代文化史》，开巴蜀文化研究先河。1942年，在李安宅和郑象铣的主持下，华大与燕京大学共同建立了华西边疆研究所。依托华大博物馆的馆藏，李安宅开展边疆调查，研究边疆事务，发表了《论边疆服务》《实地研究与边疆》《边疆社会工作》等一系列关于华西边疆研究的重要著作。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正处于东西文明剧烈碰撞的阵痛期。华大博物馆始于西方传教士的博物馆实践，也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探索文化主体性的尝试，是近代中国在动荡中追求科学理性与文化自觉的缩影，其学术遗产至今仍在学术与公众领域焕发活力。

① 本篇原用英文所写作，在民国二十三年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第6卷发表，因应袁同礼先生之嘱，乃略加修改，由林名均先生译成中文。林名均所译此文正为葛维汉于1934年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上发表的《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The 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 Museums*），但是馆藏数据有明显不同，应该是林名均在翻译时根据馆藏数量做出了变更。

② 出自1947年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油印本《刘盛舆笔记》所载的郑德坤《五年来之华西大学博物馆》，参见安琪：《博物馆民族志：中国西南地区的物象叙事与族群历史》，民族出版社，2014年，第85页。

参考文献

[1] BEECH J. University beginnings: a story of the 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J].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ies, 1933−1934(6): 92.

[2] 安琪. 博物馆民族志: 中国西南地区的物象叙事与族群历史[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4.

[3] GRAHAM D C. The 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 Museums[J].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ies, 1933−1934(6): 132−137.

[4] 四川大学博物馆.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整理影印全本): 第3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5] 中国博物馆协会. 中国博物馆一览[M]. 北京: 中国博物馆协会, 1936: 91−94.

[6] 华西大学古物博物馆概况[J]. 文物参考资料, 1951(11): 61−68.

[7] 陈长虹. 四川大学博物馆: 历史与今天[M]//朱凤瀚, 中国博物馆学会. 回顾与展望: 中国博物馆发展百年.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2005: 147.

[8] 卫聚贤. 华西大学博物馆参观记[J]. 说文月刊, 1940, 2(8): 1−4.

[9] 黄思礼, 秦和平, 何启浩. 华西协和大学[M]. 珠海: 珠海出版社, 1999: 134−135.

[10] 葛维汉, 宋伯胤. 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概况[M]//李淑萍, 宋伯胤. 博物馆历史文选.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0: 268.

[11] 四川大学博物馆. 四川大学博物馆馆藏目录[Z]. 复印本. 成都: 四川大学博物馆, 1947.

[12] Letter to Mr. Hutson from D. S. Dye (1919−12−18)[A]. 成都: 四川大学博物馆: 2010−314.

[13] Museum Evening With the College Students (1920−01−17)[A]. 成都: 四川大学博物馆: 2010−64.

[14] Letter to Clif from D. S. Dye (1920−03−09)[A]. 成都: 四川大学博物馆: 2010−290.

[15] Letter to Mrs. Hampson from D. S. Dye (1919−12−17)[A]. 成都: 四川大学博物馆: 2010−315.

[16] 周蜀蓉.《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作者小传[M]//四川大学博物馆.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 第10册. 整理影印全本.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4591.

[17] Letter to Quentin from D. S. Dye (1922−02−16)[A]. 成都: 四川大学博物馆: 2010−599.

[18] Letter to D. S. Dye from D. C. Graham (1925−08−13)[A]. 成都: 四川大学博物馆: 2010−1017.

[19] Letter to D. S. Dye from D. C. Graham (1925−10−14)[A]. 成都: 四川大学博物馆: 2010−1049.

[20] Letter to D. S. Dye from D. C. Graham (1925−12−13)[A]. 成都: 四川大学博物馆: 2010−1050.

[21] Letter to D. S. Dye from D. C. Graham (1929−05−23)[A]. 成都: 四川大学博物馆: 2010−1014.

[22] Letter to D. S. Dye from D. C. Graham (1930−09−12)[A]. 成都: 四川大学博物馆: 2010−1032.

[23] Minutes of the Museum Committee of the 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 Museum of Archeology[A]. 成都: 四川大学博物馆, 1948.02.04, 2010−384.

[24] Museum Article: 2[A]. 成都: 四川大学博物馆: 2010−67.

[25] GRAHAM D C. Gifts to the 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 Museum of Archeology Between April First and October First, 1936[J]. 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1936, 38(11): 23.

[26] Items to be Traded With New Zealand (1921−05)[A]. 成都: 四川大学博物馆: 2010−66.

[27] 翁文灏. 私立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概况[J].科学, 1935, 19(7−12): 1475−1476.

[28] 四川大学博物馆. 百年华章: 四川大学博物馆馆史回顾展海报[Z]. 成都: 四川大学博物馆, 2014.

[29] DYE D S. The west China museum, or west China man and his culture[J].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1939, 11: 87.

[30] 岑家梧. 西南民族研究的回顾与前瞻[M]//岑家梧. 岑家梧民族研究文集.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92: 31.

[31] 葛维汉, 林名均. 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概况[J]. 中国博物馆协会会报, 1935, 1(3).

[32] 周蜀蓉. 传教士与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的创建[J]. 宗教学研究, 2014(4).

[33] 华西校史编委会. 华西医科大学校史: 1910−1985[M].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0: 80.